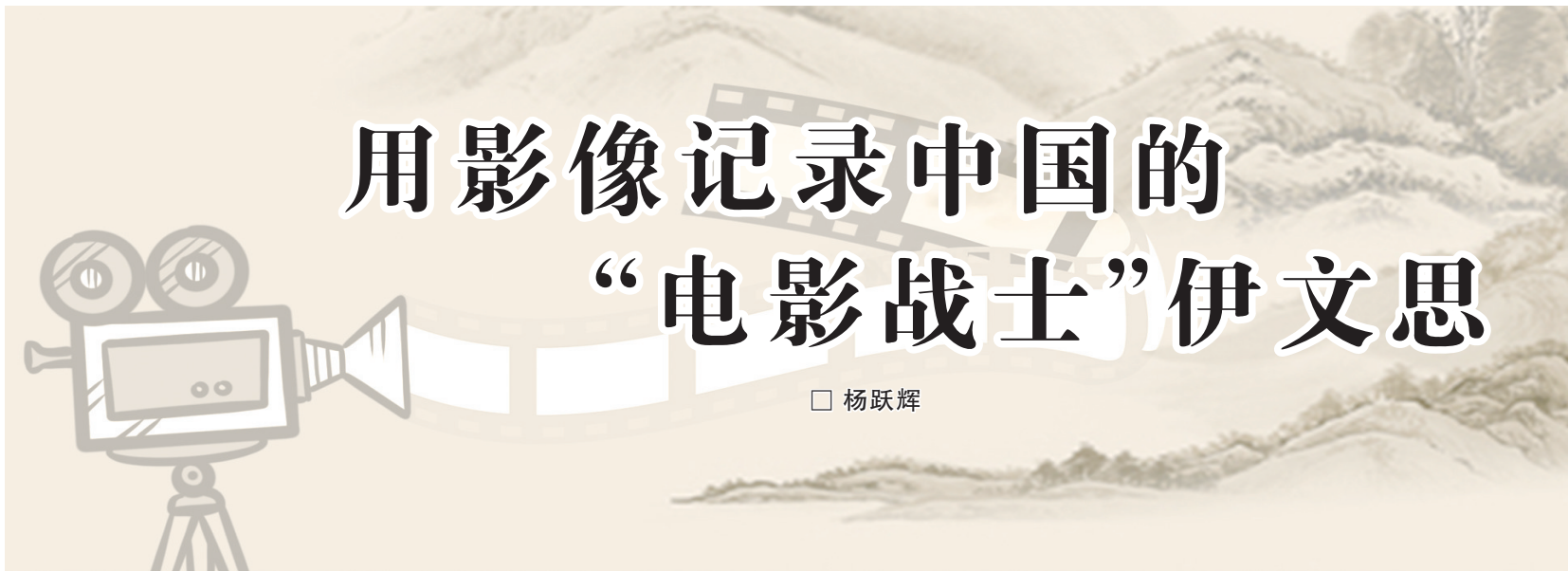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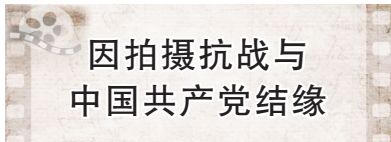




□ 杨跃辉



尤里斯·伊文思是一名荷兰人，从1938年首次来华拍摄《四万万人》，到1988年在中国完成拍摄《风的故事》，他与中国结缘长达半个世纪。伊文思多次用摄影机记录下中国的变迁，对中国的感情不亚于自己的祖国，他曾经饱含热情地说：“我热爱中国，中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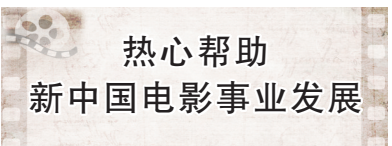


伊文思1898年11月18日出生于荷兰尼梅格城，成长于一个两代都是摄影师的家庭。受家庭的熏陶，他13岁就开始拍摄电影。与普通摄影师不同的是，伊文思关心世界的发展变化，他把电影当作武器。哪里有重大事件发生，他就把摄影机架到哪里，他的纪录片主题总是人民，始终把镜头对准普通人。他见证过西班牙内战，中国抗日战争，古巴、越南等人民争取独立与自由的革命和斗争，是一位充满激情和信仰的“电影战士”。

1938年正值中国抗日战争进行得最为激烈之时，伊文思经香港到达武汉。首次来到中国，伊文思对中国了解不多，这一时期他对中国更多是出于“同情”和“救助”。伊文思很想去延安拍摄中国共产党抗日的画面，从纽约出发前他就秘密联系了中国共产党，并在香港见到了宋庆龄和廖承志，了解了更多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信息，但是由于受到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的种种阻挠，伊文思此行并未能到达延安。伊文思在中国拍摄了名为《四万万人民》的纪录片，反映了从武汉到台

儿庄战地的见闻，在美国放映后，起到了声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积极作用，影片中还出现了朱德、周恩来等共产党领导人。

伊文思在武汉认识了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国共产党人，并与他们建立了个人友谊。在拍摄工作队中一位共产党员的帮助下，伊文思拍摄了许多珍贵的画面，为新中国保存了珍贵的历史档案。离开中国前，伊文思秘密地把一台埃姆牌独眼龙摄影机和数千尺胶片交给了一位左翼影人吴印咸。1938年秋，吴印咸和袁牧之带着这台摄影机和从香港购得的全套电影器材到达延安，在八路军总政治部成立了延安电影团（即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前身）。曾任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厂长的钱筱璋回忆，正是利用这台摄影机，延安电影团在艰苦的战争年代记录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和中共七大、七届二中全会、延安生活等重大历史影像资料。这些动人镜头的呈现，正是伊文思的重要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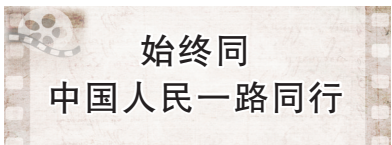
伊文思赠送给延安电影团的摄影机帮助中国打开了电影艺术的大门，他对中国电影事业的贡献远不止于此。在新中国成立后，伊文思多次来到中国，热心地把他的知识与经验传授给中国的青年电影艺术工作者，为新中国培养电影人才，并向世界客观介绍中国，消除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许多误解。

1956年伊文思再度访华，成为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接待的第一位“国际友人”。他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衷地感到喜悦。两年后，伊文思愉快地接受了新影的邀请，成为新影的艺术顾问，并开始在中国授课，向中国的电影工作者传授他的拍摄技巧、艺术观和视听理

论。后来，伊文思又成为文化部的顾问，为中国电影乃至文化事业的发展都作出了贡献。曾任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的司徒慧敏回忆说，“伊文思把中国电影事业、电影艺术工作中的每一步成功和每一点失误，都当作自己的成功与失误一样关切”。

伊文思多次去电影学院讲学，在电影制片厂进行具体指导，还经常向中国电影工作者介绍西欧、拉美和亚非地区电影发展情况和他们的经验。伊文思认为，真实反映生活是纪录片的生命，他要求自己拍的每一个镜头都是真实的，从不在摄制中违背生活真实去制造情节。夏衍、袁牧之、王闾西、司徒慧敏、吴印咸、钱筱璋等中国早期的电影艺术工作者大都与伊文思有过深入交往，受到他的影响。

伊文思对中国电影事业的关心还体现在具体的细节中。新中国成立初期，在1954年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上，伊文思向廖承志同志建议拍摄故事片《白求恩大夫》。但是由于受到当时条件的影响，这部影片迟迟未能完成拍摄，一直拖延到1958年他来中国访问时，又再次与廖承志同志商量，并帮助做了大量工作，终于在1964年完成了拍摄，这部影片在新中国电影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



正如伊文思自己所谈，“中国是我的第二故乡”，从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开始，他就坚定地支持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新中国成立后，他十余次来到中国，先后拍摄了《早春》《愚公移山》和《风的故事》等关于中国的影片，分别记录了上世纪50年代末、70年代和改革开放不同时期的中国风貌，以一个外国人的视角见证了中国半个世纪的变迁。在中国社会不被外界了解或者受到西方舆论封杀的时候，伊

文思拍摄的这些纪录片为世界认识中国开了一扇窗。

1957年再次来到中国后，伊文思不辞辛劳跨越了大半个中国，拍摄了反映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影片《早春》。虽然当时正值大跃进时期，影片却完全不同于当时许多反映“大跃进”时代主流的纪录片，他把拍摄的主体放在了人们真实的日常生活和中华大地的自然风光上，记录了当时的风土人情，传达出一位艺术家对社会主义的歌颂与赞美之情。

1971年，受周恩来总理邀请，伊文思再次来到中国拍摄了一部反映当时社会精神面貌的纪录片《愚公移山》。在周恩来的指示下，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全程配合进行了拍摄，该片历时5年才完成，长达12个小时。这是一部综合反映中国社会变化的鸿篇巨制，由大庆油田、上海第三医药商店、上海电机厂、“一位妇女，一个家庭”、渔村、一座军营、球的故事、秦教授、京剧排练、北京杂技团练功、手工艺艺人、对上海的印象等12个部分组成，每个主题的内容长短不一。该片是记录“文革”期间中国社会的珍贵影像资料，在1976年公映。伊文思充满满意地用中国人熟悉的愚公移山，来形容当时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努力。

1984年，伊文思再次来到中国拍摄纪录片《风的故事》，这是他拍摄的关于中国的最后一部作品，也是他电影生涯的收官之作，1988年才制作完成。他希望通过此片告诉人们，“和平是最重要的”。伊文思因该片获得第二届欧洲电影奖特别成就奖。1989年6月28日，尤里斯·伊文思在法国巴黎去世。

从《四万万人民》开始，在几十年的岁月长河中，伊文思用摄影机记录下不同姿态的中国，见证了不同时期的中国形象，也和中国人民一起经历着社会主义发展的风风雨雨。中国影像成为伊文思电影生涯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也证明了他对中国这个第二故乡的热爱。

汉语中“慈善”一词出自《论语·为政》：“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从慈善这个词的原点看，儒家的慈善观里，一开始就关注修养个人德行与其社会效应的关系。

与慈善有关的内容和思想在传统儒家典籍中可以说比比皆是。儒家思想在推动我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作用，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对中华文明的影响极其深远，堪称诸子百家之首，同时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体系中也蕴含着大量的慈善思想。儒家文化中的许多核心观点，如民本思想、大同理想，是发展慈善事业的立足点和根本追求；儒家的仁爱思想中，性善论、义利价值观等俱是人们从事公益慈善的出发点和思想根源。

我国历史上以“仁”为中心的儒家思想，构筑了民本思想、大同社会等系统的核心价值理论体系，成为中国古代慈善思想最主要的理论渊源。“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他的慈善思想是以仁为中心构建的，包括“泛爱众”、“惠民”、“均贫富”和“义利观”等内容，对历代以来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孔子认为“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仁德是修身的关键。一个人只要立志于培养自己的仁德，那么他就不会做坏事。如果一个人失掉仁德，也就不能成为君子，君子应该时时刻刻不违背仁德。孔子认为仁德甚至比生命更宝贵：志士仁人不能因为求生损害仁德，当生命和仁德冲突时宁可杀身以成仁。

传统中国，慈善举动主要源自人们内心的道德驱动，靠的是“良心发现”和“自省吾身”，缺乏外在的约束，同时也容易夹杂着对道德回报的期待。儒家对道德的依赖，使得慈善缺乏强制力的约束，在道德文明遭遇阻碍困境的时候，人们的主观慈善意识弱化，常常会给慈善事业带来重大影响和打击。因此，这种内敛、强调道德教化的慈善并不利于积极、开放的现代慈善事业的发展。

与慈善观相关的另一个先秦儒家观念是义利观，义利观是指人们如何对待伦理道德和物质利益关系问题的观点。孔孟义利观的基本观点是义高于利、义主利从，但并不排斥谋取正当利益。孔子提出“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见利思义”“义然后取”，明确以义为谋利的准则；倘不符合此准则，则“君子固穷”，宁肯处于贫贱之中，也不取这不义之利。孔子因此对饿死在首阳山的伯夷、叔齐评价很高：对安贫乐道的大弟子颜回称赞有加；他自己在陈国绝粮，处于困境，仍“讲诵弦歌不衰”。由此可见，孔子是言行一致的。

孔子认为，义字当头还是利字



□ 张春茂

当头，结果是大不一样的。“放于利而行，多怨”；“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利字当头、争权夺利，必然激化矛盾、积仇积怨，不利于解决全局问题和大局问题。

不难看出，儒家的确首先重视义，但并不以义利对立作为理解义利关系的基本前提。因此，即使儒家强调重义轻利，也不是要把义和利对立起来。只是在义与利尖锐对立的特殊情境中，儒家才明确主张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牺牲利益而成就道义。

近年来，我国的慈善事业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慈善事业的发展需要一种社会氛围，需要全体公民的广泛参与和支持。因此，古为今用，从先贤儒家核心价值思想中认真汲取其伟大的慈善观念，不失为一条促进我国现代慈善事业发展的理论路径。



胡文虎（1882—1954年）是近代享誉海内外的企业家、报业家、慈善家，他出生于缅甸仰光，祖籍在福建龙岩，是一位客家人。胡文虎头脑灵活，性格外向，有探索精神，且吃苦耐劳。他继承了父亲的小药铺后，深入钻研药业发展规律，思索永安堂发展壮大路径。

万金油大王

胡文虎利用科学方法，吸收我国传统工艺炼制丸、散、膏、丹的优点，经过反复研究和试验，终于发明制造出了良药——“虎标”牌“万金油”。此后，胡文虎再接再厉，继续研制出成药百种。这些药品因价廉物美，功效显著，在中国、缅甸、印尼、印度、马来西亚等国深受欢迎。且胡文虎重视广告的投放，投入巨资的宣传使万金油等药品的知名度越来越高，持续畅销。

随着万金油等药品的市场规模不断扩大，胡文虎很快成为了世界知名的亿万富翁、华商顶级富豪。当时有经济学家估算，全球有半数以上的人使用过虎标良药，仅万金油在全球的销量就高达两百多亿瓶。胡文虎本人也被誉为“万金油大王”。

1923年，胡文虎出于拓展业务的考虑，把永安堂的总部迁至新加坡，并在新加坡新建药厂，扩大生产规模，其弟胡文豹则继续负责仰光的事务。随着市场的快速扩张，永安堂先后在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等地开

设分部。经过9年的快速发展，1932年，胡文虎将永安堂总部设在香港，并将业务扩展到祖国东南沿海及西南内地，相继在广州、厦门、上海、重庆等十余个城市建设药厂和分部。

报业巨子

永安堂的蓬勃发展，以及“万金油”等虎标良药的热销，给胡文虎带来了巨额财富。有了坚实的基础后，胡文虎又更多地致力于投资传媒等其他生意。从1913年起，他先后与人合办了《仰中光日报》《晨报》等，在香港、厦门、福州、上海等城市以及马来西亚、缅甸、印度、泰国等国家，胡文虎独资创办了《星洲日报》《星光日报》等十余家报社，建立了他的“星系报业”王国。胡文虎给星系报业的定位是：“不以营利为目的，专以服务为前提，宣传抗日救国，竖民众之信念。”他主张开明办报，新闻自由，加之在海外少受各方势力掣肘，如此一来，报纸的特色突出，声誉日隆，逐渐发展成为传播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激发海外华侨爱国热情、振奋民



族精神、促进抗日的重要传媒阵地。

在报业史上，星系报业以发展最迅速、规模最庞大创造了一个奇迹，成为华侨界独一无二的报业王国，具有很大的舆论影响。胡文虎以商业立场办报，为民众作喉舌，形成服务于社会的重要事业。这也是胡文虎从“药业大王”到“报业巨子”的传奇飞跃。

星系报业在宣传虎标良药方面起到了特殊的作用，使万金油深入人

□ 车 凤

虎标制造者胡文虎的三个身份

心，家喻户晓，世人皆知；而万金油的兴旺，又为办报提供了雄厚的资金。胡文虎拥有巨额财富后，曾经购买飞机给订购客户送报纸，这在当时的亚洲世界极富传奇色彩，也起到了巨大的宣传作用。上世纪30年代中后期，胡文虎已成为东南亚华侨首富，他的商业体系涵盖了制药、报纸、银行、保险等多种行业，形成了覆盖东亚、东南亚的巨型财团。在鼎盛时期，胡文虎的财富一度超过上亿美元，这在上世纪30年代无疑是惊人的成就。也正是在这样雄厚的财力支撑下，胡文虎一直以来所热衷的慈善事业才得以蓬勃发展，并产生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著名慈善家

胡文虎在商业上取得巨大成功后，长期持续且大量投入慈善公益事业，所涉领域非常广泛。他一贯秉持“人为本，财为用”的人生信条，并坦言自己对政治没有兴趣，更多热衷于包括文化教育、体育、医药等利国利民的慈善事业。胡文虎说：“我（之财

富）是取诸社会，用诸社会。”“自我得之，自我散之，以天下之财，供天下之用。”

在胡文虎投身的慈善公益事业当中，教育事业占据了较大比重。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社会的经济和教育领域均遭到广泛而严重的破坏和影响，大量青年无学可上。这种情况下，胡文虎在祖国内地大量投资办学，聘请著名知识分子赴校任教，联络各界爱国人士，广泛开展抗日救国宣传。

此外，胡文虎在祖国内地还先后捐资兴建了十余所医院，包括南京中央医院、福州福建省立医院、厦门中山医院、汕头医院、广州广东军医院等。抗日战争期间，胡文虎致函重庆政府，愿出资在全国修建县级医院100所。工作人员计算百所医院需款项约1000万元，胡文虎当即汇款1000万元，并指定该款项在抗战胜利后兴建县级医院所专用。

20世纪上半叶，鉴于祖国体育事业长期落后，为雪“东亚病夫”之耻，胡文虎曾多次捐建体育场所，支持体育竞赛，以此推动国内体育事业的发展。除赞助体育团体的建设和活

动经费外，他也独资修建体育设施，如福州体育场、海南岛海口白沙游泳场等。胡文虎还赞助了上海于1935年举办的旧中国第六届全国运动会，并亲率华侨运动员回国参与体育比赛。

胡文虎对祖国故土怀有深厚的情感，他同广大海外华侨一样，长期关心祖国的建设与发展。除了上述公益领域，胡文虎还在祖国建设了安老院（养老院）、孤儿院多所。此外，还捐款兴办了收容流浪儿童的上海儿童教养所、广州儿童新村等。新中国成立后，胡文虎积极联络国内开展慈善事业。他曾认购公债2万份，捐赠港币13万元，为广州儿童教养院修建礼堂一座。

抗战爆发后，胡文虎不仅给前线抗日勇士捐赠钱款、药品和物资，同时还斥资组建华侨救护队，奔赴国内战场投身救死扶伤。在抗日战争期间，胡文虎为国内捐赠大量药物，义捐、认购超过300万元的“抗日救国公债”，此外还有慰劳伤病、保育儿童等善举。

弹指百年。如今，胡文虎建立的商业帝国虽已不复存在，但他在激烈竞争中独创华人品牌、在祖国最艰难的时候勇于担当、共赴国难的义举，仍然值得人们铭记。

